

朋友

于光远 著

和朋友们的书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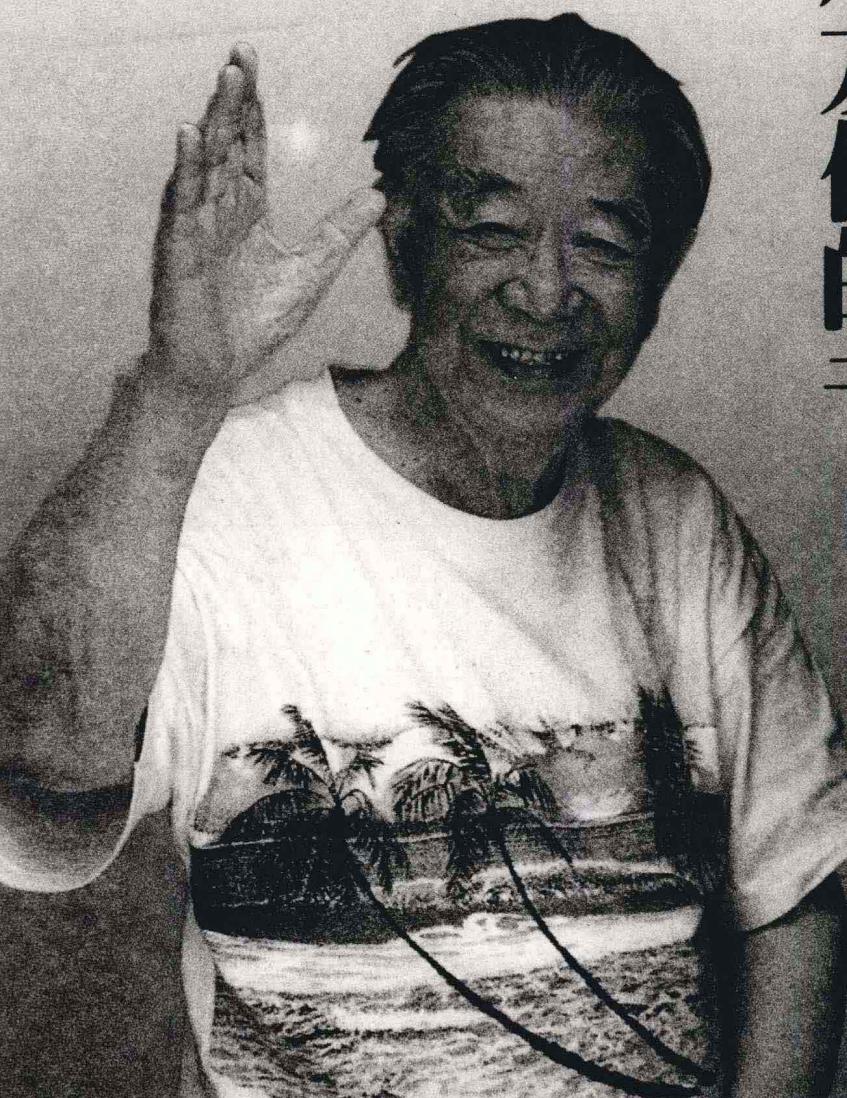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朋友

和朋友们的书

1

于光远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朋友和朋友们的书. 1 /于光远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1

ISBN 7-5438-2799-9

I . 朋... II . 于... III .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书评
—中国—选集 IV . ①I267②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6539 号

责任编辑:陈 敬
张人石
装帧设计:陈 新

朋友和朋友们的书(1)

于光远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政院印刷厂印刷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9.375

字数:226,000 印数:1—4,000

ISBN7-5438-2799-9

I·331 定价:14.80元

前 言

编这本书没有少花我的时间。

我做了好几件也许是不必要的事情。

在编这本书的第一集时，我就决定不完全按照汉语大辞典的那套《书友文丛》的编辑方针——仅仅作为一本散文集来编。我想既然决定编一本关于朋友的书，就要对自己的朋友作一番系统的回顾。于是我就从总角之交到最近才结识的朋友一个一个地去想了一下，在进行这种回忆中，朋友们的身影、容貌、声音、举止和我与他（她）有关的往事，也就一个一个地浮现在眼前。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但是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的朋友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不愿在自己的记忆中失去任何一个朋友。有时忽然想起一个好久没有想起的朋友，我就会有一种好像新结交一个朋友似的那样高兴。有时想起一个朋友，

他的模样、他做过的事、他与我的交往，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可就是名字叫不出了——这是老年人常有的现象。为了把他（她）的名字记起来，常想一两个小时。想出来后赶快用笔记下来，生怕再次忘记。我做这样的事花的时间是很值得的。但是花的时间拖得太长了。

这次我对朋友进行系统的回顾，采取的办法是着手写一篇《我的交友简史》。一面写一面想，然后一次一次地补充。夏衍对沈宁说，他的朋友有一千人。我猜他说这话的时候只是估量了一下，而我现在是在下笨功夫一个一个地去回忆，要求回忆到的人有名有姓，大概何时相识。从编第一集开始到结束时，我回忆到的人，也快达到一千这个数目了。从已经写出的那个一万几千字的《简史》稿来看，不能不承认还是厚古薄今、虎头蛇尾。应该把直到最近结交的朋友都记进去，才能比较准确地说我有多少朋友。当然不遗漏是不可能的，我希望遗漏的尽可能少一些。

在回顾中我弄明白自己交友结构变化的历程：（一）少年时期只在学校和亲戚之间有极少数朋友。（二）在北平参加“一二·九”运动，一下子认识了如此之多的革命者，改变了自己的交友结构。（三）本人成为职业革命者那些年，我只和党内同志及我的工作对象接触，加上战争环境，几乎完全中断了其他社会关系。（四）在作为执政党的党的机关及其领导下的国家机关工作，同僚成为交友的主要渠道。（五）由于本人从事学术研究和组织推动学术活动，在自己的交友结构中增加了众多的学者。（六）在 1982 年我发表的公开信件中阐述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应该有众多的党员不做官，仍然站在群众之中、群众前面，领导群众，争取民主和群众自身的长远和切身利益。本人就准备按照这个思想和方法行事。因而在十二大后，主要结交了众多的民间的朋友——学者们，同我一样从原工作岗位退下来的领导干部等。（七）因为患癌和年岁增长等原因，学写散文，开始与作家

们交友。

写这篇《简史》时，我还概括了一下近十多年来交友的主要渠道，有这么几种：（一）参加和组织民间的学术团体和会议，在这样的团体中和人们交流认识，这种形式对我这样的人应该是比较适宜的工作方式。（二）多种形式的合作写书，搞理论、学术、文化的基本建设，并且创办一些刊物进行通俗宣传。（三）与各种邪恶势力，如伪科学、伪人体科学、伪生命科学和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作斗争。结交志同道合者、并肩作战者。（四）我是个“发起家”，每年总要发起几件这种或那种事情，我发起的事情是不准备自己投入力量去做的，否则我就当不成发起家了；但是我既然发起了就很想把这件事办成，这就要寻求支持我落实我所发起的事情的朋友。我认为如果有人对我发起的事情有兴趣，而且去做，把它落在实处，做出成绩，这是对我的一种最大的鼓励，我就很愿和他交友。我最近概括出能把事情办成、办好要做到四条：“思想开路、人才决定、组织保证、金钱后盾。”我也希望企业家能够成为我发起的某些事的后盾，在我的朋友中又有了企业家这一类。（五）我还好为人师，愿意和青年交友，给他们以帮助。

我的这篇《简史》着手写的时候，是想收入这本书里的。写了一半，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要把它写得生动具体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而从我写出的这篇《简史》文章来看，达不到这个要求。同时我又觉得还没有写完。

我还做了一件也许对编书来说是不必做的事情，那就是“我对什么是朋友”这个概念下功夫抠了一下，并且写成了一篇两千字的文章——《什么是朋友》。文章开始我写了几行字：“我有一个习惯。在使用一个概念时，总要把它抠个清清楚楚，这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当然是个好习惯，但是对于写散文，却很可能是个缺点。动笔前先咬文嚼字、啰嗦一番，才切入正题，会使人

厌烦。这是近年来才有的认识。”然而我还是感到这么咬一咬、嚼一嚼挺有味道。比如现在我编这本书，我就想把“什么是朋友”这个概念抠清楚，并把抠的结果写成文字。原先我想把这篇文章作为书的第二个序言，后来怕读者生厌，改成附录。最后我决定连这个“附录”也不收入了。对“朋友”这种人伦，由于它十分重要，有关的文献很多很多，但是我还是想好好地研究一下。现在写出的那二千字，当然即便在原理方面也远没有讲透。朋友这种人伦是很复杂的，朋友的类别很多。友谊既有质的规定性，也有量的规定性，这篇文章就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提纲，暂时留下来吧。

于是问题变得很简单：把手边已有的关于朋友的稿子编排了一下，作了一些必要的整理，就把第一集的文稿交出去了，几个月后书也就出版了。^{*}

这次我继续编第二集时又想过把《交友简史》和《什么是朋友》收入进去，结果还是几年前同样的理由，先不收入吧。

现在收入的一百四十多篇，写到的人虽然也有一些新朋友，但大都是老朋友，内容文字比较有分量的也大都是老朋友。我不想把要写的人局限在老朋友的范围之内。编出的书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并非我本人的愿望，但是由于这是编书，它的内容只能由原来的文稿决定。那些文稿大都不是主动写的，我希望以后更多写一些向朋友们学习的文章。希望过若干年再来编时，面目有所改变。

我写这些文章完全没有计划。我最不喜欢的是因为哪位朋友突然作古，而使我非写不可，但虽然很不喜欢，这样的文章占的

^{*} 现在呈奉在读者手中的《朋友和朋友们的书》共两集。第一集的主体内容曾于1997年8月由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以《朋友和朋友们的书初集》为名出版过。第二集的绝大部分内容是近几年新写的。

比重还是不算小。我最喜欢写的是年青的、新结识的，而且肯定会成为终生好友的。可是最值得写的、写起来内容多的，现在还抽不出时间写，看来还要出第三集、第四集。

由于不能从每篇文章的题目中看出文章都写了哪些人，我还编了一个《人名索引》，放在第二集里，便于读者知道在哪些文集里主要写了我的哪些朋友、涉及了哪些朋友。

本来我是想写篇文章讲讲我对“朋友”这一人伦的体会，还是因为时间关系，先写这样一篇吧！

这本书能够出版靠许多朋友的帮助。这也说明朋友之可贵，应该一一表示感谢。

目 录

1.01	“七月派”诗人和电子技术专家	(11)
1.02	小学初中时期的三位老师	(6)
1.03	我和他一起走上革命的道路	(14)
1.04	金岳霖——我最“老”的“老”朋友	(20)
1.05	恩师和战友 ——祝培源师九十寿辰	(31)
1.06	关于淡化家庭观念 ——记有训师生前的一次谈话	(40)
1.07	三强与我几个时期的交往	(45)
1.08	这件事得感谢申府先生	(49)
1.09	一个条幅——老朋友李昌和我	(52)
1.10	秋耘和我	(58)
1.11	见《按牌理出牌》致黄秋耘	(62)
1.12	两个《自白》	(66)
1.13	读罢韦君宜的《露莎之路》	(68)
1.14	多么坚强的人!	

	——与病床上的韦君宜的一次晤面	(72)
1.15	韦君宜最近给我的两本书	(75)
	附 韦君宜：杂家于光远	
1.16	怀念冯契	(80)
1.17	我再一次到冯契的家	(83)
1.18	朋友们的书	(85)
1.19	忆艾思奇	(91)
1.20	杨明和他的妈妈——杨匏安夫人	(100)
	附 杨明：周恩来叔叔与我的一次谈话	
1.21	写在 1996 年 10 月 14 日	(107)
1.22	袁也烈和我	(112)
1.23	统铺之交	(119)
1.24	我读《郭述申年谱》	(123)
1.25	徐特立和我的忘年交	(126)
1.26	从黎澍同志的著作中学习	(130)
1.27	黎澍逝世四周年 ——他对病和死的一些观点	(133)
1.28	轮椅上奋笔战斗的记录	(135)
1.29	人们叫他阿丕	(138)
1.30	钱俊瑞和姜君辰：好几个单位的同事	(142)
1.31	记吴华	(147)
1.32	1938 年、1939 年在广东新结识的朋友	(150)
1.33	哲学家、翻译家何思敬	(154)
1.34	初识周扬	(158)
1.35	《经济学家冯兰瑞》	(163)
1.36	一件待送往博物馆的毛衣	(165)
1.37	介绍一个“消费合作社”	(170)
1.38	我和惠德半个世纪的交往	(173)

1.39	三十位经济界友人评《探索》	(180)
1.40	我也写他三三事	(183)
	附 曾彦修：于光远二三事	
1.41	田家英的悲剧	(190)
1.42	《田家英的最后岁月》读后感	(198)
1.43	毛岸英的故事	(202)
1.44	纪念查汝强	(206)
1.45	看陈翰伯《出版文集》后写的	(209)
1.46	同病相怜	(212)
1.47	一苇重病之后	(214)
1.48	写这篇与治方商榷文章的由来	(218)
1.49	我总算履行了和治方互相点名批评的协议	(221)
1.50	在孙治方同志纪念会上的讲话	(224)
1.51	写在治方逝世十周年	(227)
1.52	我和齐燕铭在两个时期共过事	(230)
1.53	我和部下之间	(233)
1.54	悼老刘	(237)
1.55	林基洲：编译马列经典著作四十年	(242)
1.56	记胡耀邦好学不倦二三事	(245)
1.57	万里家作客归来	(250)
1.58	我的秘书小胡	(253)
1.59	两位已故的广东经济学家	(256)
1.60	忆夏公	(259)
1.61	《懒寻旧梦录》中关于“上海文委”叙述的索引	(262)
1.62	记程子华的一件轶事	(265)
1.63	李冰封的风格	(270)
1.64	致廖冰兄	(273)

- 1.65 老烈其人 (275)
1.66 金石滩：和作家们在一起 (280)

“七月派”诗人和电子技术专家

在这篇回忆文章中我写的是两个人。把这两位写在一篇文章中是因他们和我都是总角之交，他们都小我两岁左右，又都是我的亲戚。“七月派”诗人孙钿是我的堂弟，他原先的名字是郁钟瑞，我叫郁钟正。“孙钿”和“于光远”都是参加革命后自己起的名字。他和我共一个祖父的祖父。周国铨是我的表弟，和我之间的血缘关系也要追溯到我的祖父的祖父这一代。孙钿和周国铨彼此血缘靠近，前者的父亲和后者的母亲是亲兄妹。

我本姓郁，是上海的望族。我家也就是在祖父的祖父这一代从南翔（规划为封浜）迁到上海县城的。同我年龄接近的“本家”很多，但是成为朋友的只有他们两人。在我的朋友中结识最早的也是他们两人。

《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辞典》中“朋友”这一

词目的释文是“不是亲戚，相识而有好感的人”。朋友和亲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两者可以得兼。亲戚有时可以成为能够相识并且产生好感的一个条件。国铨比孙钿同我多一种关系，我们还是紧邻。他的住房就在我住房的隔壁——真正是隔壁，只是隔了一层薄薄的木板。

孙钿昨天寄来一封信，信中讲到这个月是他的生日。他是1917年出生的。周国铨比他大几个月，到1997年3月周国铨满八十岁，但很不幸，在四年前去世了。孙钿这月满七十九岁。想起当年一起玩耍的景象，到今年整整过了七十年了。孙钿每次写信几乎都提到对童年的回忆。这封信上讲到每年中秋节在顾家弄（我住的地方）、俞家弄（他住的地方。这两处是我们祖父的祖父的后代——又称“小郁家”住的地方）可以看到烧香斗。信上还说，在乔家浜（就是我祖父的祖父的哥哥那一支——即“大郁家”所住的地方）还烧大香斗。“香斗”这东西，孙钿不提，我已早忘记了。提起还记得，它是由许多支线香编成斗状的东西。似乎四周是线香，中间还放有檀香。我从来反对迷信，反对烧香拜佛，可是香烧出来的香味我却很喜欢。

孙钿这次来信还寄来广州发行的《华夏诗报》和宁波发行的《明州快报》。两报都刊有他的事迹。我们虽是弟兄，但常有不能通音信的时候。看了沈栖所写介绍他的文章，对他的经历就了解得更系统具体了。孙钿走上革命的道路不像国铨那样，他没有受到我的什么影响。他在中学时期演革命戏剧，开始写革命文学作品。十七岁那一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对诗歌发生了浓厚兴趣，参加中国剧人协会、诗歌座谈会等左翼社团的活动。抗战后写了许多诗篇，在《七月》上发表。1938年见胡风，受到胡风的鼓励。1939年加入我们党，在香港做文化工作。在香港沦陷后他照顾帮助胡风和其他一些文化人士从香港撤回内地。由于他和胡风的往来，在“反胡风运动”中被当作“反革命集团分子”在杭州监

狱关押一年。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劳动。1969年他第三次入狱，直到1971年释放。三中全会后“胡风案件”平反，1983年才恢复党籍。

孙钿在参加革命活动时和我接触不多。1933年他考入大同大学时，我倒也在那个学校，但是他在学校中呆的时间太短了，第二年就去了日本上大学。抗战爆发后，他到武汉时我也在武汉，但没有同我联系上。我一直在武汉，他却去了前方。这一年8月，他从前方向回武汉时我又去了广州。抗战后我没有去过香港，他也一直没有去延安。建国后他也很少来北京，他被打成“胡风分子”，我也只是从我上海家人那里听到一些，但是语焉不详，直到80年代我们才多次见面，在见面前我已从王元化同志处知道一些他的遭遇。在纪念胡风的一个活动中他来到北京，得以了解到比较详细一些的情况。1986年广州鲁迅纪念馆落成时又偶然相遇，1989年初我们又在宁波相会……几十年的时间使我们——当时的儿童成了八十老翁。

我在周国铨面前一直以兄长自居。我对他有一种榜样作用，但是和他性格不同，他的性格没有我开朗，这同他的家庭环境有关。我的父亲长期失业，常常靠借贷典当过日子，但我家中和睦，家庭生活比较民主。他的父亲原是上海浦东杨思桥的大地主家中的少爷，本来是很富有的，但是鸦片烟抽得很厉害，因此家境逐渐衰败。周国铨的父母之间经常吵架，甚至动手打架。因为我们两家只有一块木板之隔，吵架时听得清清楚楚。国铨作为他们的孩子当然是很苦恼的，因此他一直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快活。家里吵架特别厉害的时候他就常常到我家来“避难”。我们一家人都很同情他。他同我家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比他自己家还亲。他要玩，也只有找我一起玩。对于我们两个一起玩的事情我可以很具体地记起许多事来，有一件还是挺惊险的。两人一起郊游，各骑一辆自行车，他摔到一条水沟里，我却连人带车摔进了龙华

江。

我做什么事，他都跟着学。我喜欢自然科学，他也就向理科方面发展；我进清华物理系，他也报考清华物理系；我在清华参加“一二·九”运动，他受我影响对这个运动很同情；我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他也参加了这个党领导下的青年团体。

在我与他之间还有一段故事，我们两个人在 1937 年 7 月 28 日那天，一起在北京郊区的田村遇到日本坦克车小队。我、清华同学赵德尊是共产党员，除我俩外，有周国铨，还有汤德明、向长青两个北京大学同学都被日军抓住，在战地被拘留了几个小时。这件事的经过在 1995 年我写的文章中作过详细的描写，就不再重复。那一天的经历讲起来也真有趣。

因此我和国铨在亲戚、朋友、同学等关系外，还有“难友”这样一重关系。

在日本把我抓起来的那段时间，我们亲眼看见日军对我二十九军战士的残暴行为——在田村街上，我看到一个二十九军战士的头颅被劈开，身体在台阶上，头垂下，脑髓流出。被拘捕后，我们估计是会被枪毙的。但当时，五个人中我和赵德尊两个是共产党员不必说，其他人的表现也都很好。

那一天我和赵德尊是带着党交给的任务离开北平的。包括周国铨在内的其他三个人没有那样的任务。因此火车经过保定时我和赵下了车。我希望周国铨也留下来，他没有接受，回了上海。后来 1938 年他路过武汉时经我介绍参加了党，我们又是党内同志。不过他逝世后发给大家看的生平中却写他于 1951 年 5 月入党。其中原因我不清楚，我想不外乎后来与党没有接上关系。我只知道他后来去了昆明西南联大学习，毕业后当清华研究生，然后到英国学习电子管技术。建国后他先后在南京、北京、成都最大的电子管厂当过厂长或总工程师，并曾在电子工业部一个研究院当院长。他没有像我和孙钿那样有长期的坎坷历史，但“文

革”期间像他那样一个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科技专家，也没有被饶过，也受过冲击，被关押几十天。“文革”后我到他家去过多
次，我在他面前还是以兄长自居，他也是老样子，除叙旧外，谈谈彼此都有兴趣的科学技术问题。对政治和理论问题，他的兴趣
不大，说得就很少。

他以一个为国家的电子工业做出了很大贡献的科学技术专家的身份，给自己的一生画上了句号。他的一生同孙钿的一生有明
显的不同。我同两个人都没有说起对方的事情，这并不是有意回避，而是都没有人想起这个话题。

1996年10月3日